

杖履追随五十年

虽然 1950 年我才在国际新闻局与萧乾先生共事，但从 1937 年我读《栗子》，决心当个私淑弟子算起，真正追随时间近 60 年。抗战时期我在重庆沙坪坝南开、中央大学读书，文化区买书方便，几角钱一本，我专挑萧乾的作品读。《栗子》、《废邮存底》后，又读《梦之谷》，很喜欢其中缠绵悱恻的佳句。对《鹏程》更击节叹赏，它把一个道貌岸然的市侩内心解剖得十分透辟。《大公报》上萧乾《话说当今英格兰》的通讯我读了又读。后来老向年轻记者推荐《人生采访》，认为是记者必读之书。1943 年未领到大学毕业文凭便考进《时事新报》，在新闻界干了一辈子，更完全是受萧乾的启迪。

论年纪，萧乾只比我大 10 岁。但我们的共同点之多，

也属罕见。同样出身贫家小户，从小爱好文艺，懂点外文，因跟外国人打过交道同样难逃 1957 年那场灭顶之灾。只不过萧乾到底是世界名记者，右派帽子摘得早，下放农场监督劳动时间短；我则一戴 20 年，还跟纪昀、刘鹗这些文人一样，发配新疆，比苏武留胡还多一年。1979 年和萧乾一起复出后，才在京华真正开始了追随杖履的来往。

最近看见人家测绘报也在介绍《未带地图的旅人》，才知萧乾早已是新闻热点人物。他耄耋高龄笔耕不辍的事尽人皆知，所以这里只写萧乾诲人不倦、扶植后进的一个侧面。

首先我钦佩萧乾的文笔，真可算是“传神文笔足千秋”。有好几位语言艺术家，如赵树理、沈从文、老舍，他们的文章你只要读上开头几句，便知道出自何人手笔。萧乾也是这种文体家。他的《北京城杂忆》电台一再广播，只有朗诵专家才能传达出那种京话的神韵。

最令我感念难忘的是萧乾把着我手教的往事。1950 年我在新闻局《人民中国》（英文）任社会组长，奉派采访和平宾馆高速营建工程。初出茅庐真感到不知如何下手。萧乾亲往工地，带我找工人师傅、施工干部以至董事长乐松生攀谈，回来才写出《和平宾馆诞生记》。刊出后译为语义双关的 *They Build for Peace*，是出自冯锡良手笔。中文还在《新观察》刊出。

同年秋天，为编译宋庆龄文集《为新中国奋斗》，中宣部调来各路精兵为译文（原文全是英文）润色加工。局中派萧乾、徐迟、汪衡和我与柳无垢、翟一我等脱产突击。此书曾获得苏联和平奖。

同年秋天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在北京中南海举行，我被派去参加编译组，与朱光潜、李赋宁、杨周翰、方敬等名家一起参加定稿。有了上述几件小事，萧乾后来老向人介绍我是“满腹经纶”，我暗暗惭愧说，外文我本是半瓶醋，哪能“满”呢。

1979年我与萧乾在京华同时复出，拿起笔来后，才开始七年的频繁来往。由于社会上只知道萧乾是名作家，对他把中国文化向外介绍方面知之不多，我写了篇14000字的专文《文艺使者——记萧乾》，概述他早年编《中国简报》，当斯诺助手编《活的中国》，在英国出了介绍中国文化的五本书等经历。此文曾于1983年8—9月在香港《文汇报》连载，还在大陆的《百花洲》刊出，使读者了解他也是文学翻译家。1984年我病残以后，一直继续写了萧乾与英国作家魏礼（Arthur Waley）、福斯特（Edward Morgan Foster）、艾克敦（Harold Acton）等人的交往，陆续完成了本书的各个章节。

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萧乾扶植后进的高风亮节。现在出书难，纵然你文章妙笔生花，没有人推荐，文稿只能束之高阁。我病残10年出的10种书，每一种都离不开萧乾的援引说项。《沈从文传》今天销行不错，当初萧乾为我找过三家出版社，最后才由北京的时事出版社拍板。最近萧乾听到我护理费惊人，一个爬格子的人怎能承受下去，又推荐我为港报写专栏，挣点港币来弥补。今天我能黎明即起日产两篇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未被淹没，饮水思源，不能不想着萧乾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
而萧乾继承鲁迅、叶圣陶、沈从文的风范，甘当人梯

扶植青年作者，把奖掖后进当作一种社会责任，更是一贯的。我知道有两位年轻作者经萧乾推荐，10年中在国内外出书多种，对他感念不尽。但萧乾却说，他“一向喜欢年轻朋友，除那21年，身边总有好几位。他们可减缓我的衰老，可避免对外界闭塞。从他们身上可以呼吸到新鲜气息”。

翻译家萧乾

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大师几乎都是多面手，即创作之余，兼擅翻译。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的集子里都短不了几卷译文。萧乾也是以作家兼翻译家的双重身份在 30 年代跨进中国文坛的，所不同的是，萧乾的翻译工作兼顾了两个方而，即一面把中国文学向西方读者介绍，另一面又把世界名著介绍给国内的读者。

中译英的工作

萧乾从 30 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学的工作，在这点上，他算得是筚路蓝缕的先行者。

1931 年萧乾在北平帮美国人安澜（William D. Allen）编辑英文《中国简报》（*China in Brief*），这时他刚 21 岁，是刊物的文艺主编。他在刊物上逐一介绍了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郁达夫、沈从文几位大家，还计划介绍徐志摩、蒋光慈、叶圣陶、张资平、谢冰心、丁玲、苏曼殊等作家，只是后来因刊物停办未能实现。

1932 年，萧乾翻译了三个中国现代剧本，即田汉的独幕剧《湖上的悲剧》、郭沫若的《王昭君》和熊佛西的《艺术家》。译文都刊于同年的《辅仁学报》，1984 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《珍珠米》英文本也收入了这三篇译文。

1933 年，萧乾和好友杨刚一起帮助老师斯诺（Edgar Snow）编译《活的中国》（*Living China*），这是向英美读者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集子。书中编选了 15 位中国作家的小说 23 篇。这些小说中除了鲁迅的六篇由姚莘农翻译外，其余 17 篇的译文都出自萧乾和杨刚之手。这 15 位作家是：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郁达夫、丁玲、柔石、沈从文、林语堂、田军、张天翼、沙汀、孙席珍、萧乾、杨刚。这样，从 1933 年到 1935 年间，萧乾同杨刚

先后把 20 多位作家的作品介绍到西方读者的面前，在当时西方汉学家只重视唐诗宋词等古典作品的风气下，正好填补了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空白。

萧乾在 1942—1944 年的三年间，先后在美国出版了五个集子。其中的《苦难时代的蚀画》 (*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*)、《中国而非华夏》(*China but not Cathay*)、《龙须与蓝图》(*Dragon Beards Versus Blueprints*) 和《蚕》(*The Spinners of Silk*) 都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。各书内容详见下章。

介绍西方名著的工作

文化交流包括输出与引进两方面的工作。萧乾在上述一段时期着重在前一个方面，从 50 年代起他就转而从事引进的工作。他在专业翻译的两三年里译出了《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选》(*Tales from Shakespeare*)、《好兵帅克》(*The Good Soldier Schweik*)、《大伟人江奈生·魏尔德传》(*Joanathon Wild the Great*) 三部名著。可惜的是，50 年代中期那场政治风暴使萧乾不得不放下那管生花妙笔。风暴持续了整整 20 年。在整个 60 年代他只译了一本《里柯克讽刺小品选》。70 年代他只和别人一起译了《屠场》(*The Jungle*)、《战争风云》(*The Winds of War*) 和《弃儿汤姆·琼斯的历史》(*Tom Jones*)。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

拨乱反正的春风展开文艺界中兴盛世的局面后，他又翻译了易卜生的名作《培尔·金特》（*Peer Gynt*），剧本曾由中央戏剧学院在北京上演。

纵观萧乾翻译外国名著的成果虽然只有上述几种，但可喜的是，这些作品在出版后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，译本一再重印。如《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选》印了 84 万册，《战争风云》印了 58 万册，《好兵帅克》16 万册，《屠场》16 万册。这种印数在近年来都可算比较大的。

一本译著能够一纸风行，除了靠原书的主题内容外，全仗译文的流利畅达，善于传达原作的意境丰神。萧乾说过：“翻译不是拓版，而是要传神。如果原文是悲惨的，你不能表达那种感情，那是死译，硬译，要不得！如果原文是逗人乐的，结果人家绷着脸，一点也不乐，这也是最蹩脚的翻译。（《谈文学翻译》）”

萧乾译文的可贵处，正在于它能铢两悉称地曲尽原文的意蕴，表达原作的风格。如《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选》原是为青少年读者写的，译文就采用儿童的语言；《好兵帅克》写的是军人，译文就完全是大兵的口气。萧乾一向谦称自己不懂诗，生平未写过一行。是不是真不懂呢？请看他译 18 世纪诗人蒲伯的诗：

Do good by stealth . and blush to find fame.

暗中行善事，赧然愧人知。

True wit is nature to advantage drest,

What off' was thought, but ne'er so well

express.

真才华能使大自然显得更姣好，
它常能为人领略，却难以言表。

此种笔法可谓再现了 18 世纪诗歌的格调。然而当译者逐译《好兵帅克》中那位满怀幽思的囚徒的题壁诗时，又译得多么情意绵绵，切合囚徒的口气，请看——

I sit in sorrow by the stream,
The sun is hid behind the hill.
I watch the uplands as they gream,
where my beloved tarries still.
闷来溪旁坐，太阳入山隈。
阜丘映微光，佳人犹未来。

下面我们从《里柯克讽刺小品选》中信手摘出几处译文。这些译文看似平易，但只要一仔细推敲，就会看出译者多么擅长于用合乎规范的娴熟汉语，把原作的细微处表达得意到笔随，字字熨贴，读起来如行云流水，不忍释手。

Nobody came and went. There was
nowhere to come and go. In the solitude of the
dark winter nights the stillness was that of eter-
nity.

没有人来人往，因为既无处可来，也无处

可往。在孤独、漆黑的冬夜里，万籁俱寂，直如进入一个永恒的世界。

“既无处可来，也无处可往”多么娴熟的口语！它读来上口，听来顺耳，完全没有萧乾痛恨的那种“直译”——冗长的名字，别扭的对话，需要推敲的复句，囫囵吞枣的段落……

E. P. came to his own. In less than no time he was in everything and knew everybody.

文菲真是如鱼得水。没多久事事都有他一份，不论谁他都认识了。

His strong points was the personal contact of electioneering, of bar-room treats. This gave full scope for his marvellous talent for flattery and make-believe.

他主要的法宝是通过私人联络和请人去酒吧间喝酒来拉选票。这时，他可以充分发挥他那身逢迎拍马、招摇撞骗的惊人本领了。

There is something of magic appeal in the rush and movement of a “boom” town — just a clatter of hammers and saws, rounds of drinks and rolls of money.

一个“繁荣”城市在那熙熙攘攘、川流不息的尘嚣中，自有一种迷人的魅力——到处都

在大兴土木，到处都在觥筹交错，到处都是成叠成叠的钞票。

完全是活生生的口语，没有一点舞台腔。这样的译文读起来自然会引人入胜，这不是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文风吗？

我们祝祷萧乾译出更多的外国名著，为祖国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更大的财富。

文艺使者

小时候爱好文学，也喜欢读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本。记得初读林语堂的《浮生六记》英译时，那种爱不释手的心情，真不亚于吟味沈三白的原著。这类译文读多了就发现一桩奇怪现象：译的几乎全是中国古典名著。英国有两位大名鼎鼎的汉学家：赫伯特·贾尔斯(Herbert Giles)、阿瑟·魏礼。两人都毕生研究汉学，著译之多真可以说得上“等身”。魏礼还以钻研汉学的功勋获得英国皇家的爵位。可这两位汉学大家都研究中国古典文学，译的是《诗经》、《四书》、《道德经》最晚作品只到《西游记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。至于中国的新文学，两个人都未碰过。汉学家毕竟是外国人，看不起现代文学情有可原。我们自己的学者又怎样呢？好像也不怎么重视。有位作者在英国编一本

《王宝钏》曾在伦敦剧场上演。《天下》(英文)总算是学术性期刊吧,可里面也只能读到老子、庄子,诗词杂曲,明清小品,就是找不出现代作品。老牌的商务印书馆也出英文译本,有过苏曼殊的《断鸿零雁记》,真正现代作品译本我好像只读到过一本《阿 Q 正传》还有一本也是林语堂译的《从军日记》(谢冰莹作)。最近看到一份英文《中国简报》,发现作家萧乾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在这种“现代作品出关难”(指闭关锁国的关)的情况下,那么热心向欧美读者介绍中国现代作品。后来还知道,萧乾不但在 30 年代大力做文化交流工作,40 年代担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时,还以笔会(PEN)会员身份在英国报刊、电台、集会上广泛介绍中国当代文学。他在英国出版的五种著作中,有三种都是专门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。这些材料是目前萧乾传记、年表中很少提到,或虽提起而语焉不详的。本章就是着重介绍萧乾 30 至 40 年代把我国现代文学介绍给西方读者的功绩。今天我们国家有了强大的外文出版机构,翻译出版几部文艺作品不算什么难事了;但退回去半个世纪,一个人赤手空拳,全凭对祖国文艺事业的热情,依仗一管生花妙笔,把波澜壮阔的新文苑图景呈现在欧美读者的面前,这种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,在我国新文学史上的确是应该记上一笔的。

本章既然侧重介绍萧乾在文化交流工作上的业绩,不像写传记那样要求全面,因此文中只附带谈谈萧乾进入文艺界的历程。其他方面的史实,如他的记者生涯和在采访、特写方面的成就等,当然都从略。好在萧乾近年写的三篇回忆录性质的长文(《一本褪色的相册》、《未带地

图的旅人》、《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》)对自己的苦难童年,人生道路上的坎坷、摸索,都写得非常详尽、翔实。这些文章很容易找到。

文艺评论员

1931年夏天,我国文化古都北平出现了一份英文的《中国简报》。在30年代,北平、上海、沈阳、哈尔滨这类外国人聚居的城市里,外文报刊并不希罕。英文报更有的是。年过半百的报人大概都听说过《字林西报》、《密勒氏评论报》。但1931年6月1日创刊的这份八开《中国简报》却有它的独特之处:它并不刊登政治军事要闻,也没有商业行情消息,内容倒近似今天许多大报编印的文摘报。用《简报》自己的告白说,是向关心中国社会、文化进展的美国读者“介绍现代中国文艺界之情势及社会大众之趋向与其背景”。《简报》报头下面印着一行显眼大字:“关于文学、社会、艺术动向的文摘周刊”(Weekly Digest of Literary, Social, Artistic Trends)。报纸发行人是美国人安澜,文艺版主编就是20岁刚出头的萧乾。这里应该顺便订正一些萧乾传记的说法。那就是,青年作家萧乾并不像一颗熠熠闪亮的彗星一下子闯进文坛;实际情况是,远在1933年他的第一篇小说《蚕》变成铅字的前两年,英美读者早就知道中国有位文艺评论家(literary

critic) 萧乾了。

读者会问：英文报的文艺主编起码得具备两项条件：一、英文过关，写来得心应手；二、有文学素养，有一定鉴别力。这家报纸当时实际上只有安澜、萧乾两人唱“二人转”，不像现在的外文报刊，动辄有编审、专家一大套班子。每星期一个人要从打字机键盘上敲打出近万字的稿子，这位辅仁大学英文系一年级学生能胜任吗？这就需要简单交代一下萧乾是怎样横冲直撞跻身文艺界的。

前人说过，诗是“发愤”之作，文要“穷而后工”。文学创作历来大概多是身世坎坷的产品。中外文学史上许多大作家的确出身寒微，少年孤苦。唐宋八大家中至少有两位（韩愈、欧阳修）是少而孤；高尔基、狄更斯儿时也没有体验过多少天伦温暖。比起那些人来，萧乾的命运就更凄苦了。他生在一个“父亲看城门，舅舅卖白薯”的贫苦之家，父亲在孩子出生以前就离开人间。寄人篱下的寡妇妈妈，一把汗水一把泪还没把孤儿拉扯大，也停止了呼吸。这个孤儿没有尝过人世间一点温暖，整个幼年是在饥饿、孤独、凌辱中挣扎过来的。他在破尼庵里跟迂腐的老头子读“子曰诗云”，“屁股后老挨着扎肉的板子”。后来转到洋人办的工读学堂。织地毯，送羊奶，命运依然是挨打，只不过打屁股的硬木板换成了铁耙子。惟一使他扬眉吐气的是，从小作文拔尖，文章能登在《小朋友》这类杂志上。等到进书局当练习生，接触了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，他就爱上了文学。他那股创作激情，抒写自己在这苦难世界里的喜悦与悲哀的激情，就再也抑制不住了。萧乾就是在这种境况下走上文学这条路的。

说起外文，萧乾就更算“得天独厚”了。旧中国学制把英文列为各级学校主课。凡是上过新学的人，都会点“蝌蚪文”（萧乾戏指英文）五四时代作家无不兼擅翻译。新文学四位大师（鲁、郭、茅、巴）的文集里，都短不了几卷译文。（附带说一句，这也是中国作家的优越处。外国作家的全集里很少把译文收进去的。）萧乾比他们幸运的是，他早年完全生活在基督教环境里。他依靠的两个堂兄都靠宗教吃饭。四堂兄娶的嫂子还是个笃信宗教的美国姑娘。从萧乾九岁起洋嫂嫂就教他英语。他进的崇实中学是教会办的。每个礼拜祷告更得背《约翰福音》。在崇实九年，萧乾当然把《新约全书》背得滚瓜烂熟了。奇怪的是，圣经、牧师、洋人没有把这个桀骜不驯的淘气鬼领到圣灵一边，相反，他成了坚决的反教者。读了《皈依》、《鹏程》这类小说，就知道萧乾那支犀利的笔怎样鞭挞那些跟着洋枪洋炮进来的牧师，以及我国的宗教败类。学了10多年英语，萧乾只有一项收获：他熟练地掌握了这门语言。后来进辅仁、进燕京、当驻英记者，以至后半生弄外国文学，在沧海横流中还能以译书作为栖身之所，都全亏这个外文科班出身。所以当别人介绍他到《中国简报》做安澜的合伙人时，他就大胆答应下来，马上读书，找资料，没有多久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就成了《简报》独具特色的专栏。到1931年7月29日出版的第八期时，专栏已经变成由萧乾一人唱独脚戏了。我们不妨看看这位文艺主编当时公布的蓝图：

一、每期介绍一位中国当代作家，“述其身世、性格、作风，选择其代表作（指短篇）”。已介绍鲁迅、郭沫若、

茅盾、郁达夫、沈从文。准备陆续介绍：徐志摩、蒋光慈、叶绍钧（圣陶）、张资平、周作人、谢冰心、丁玲、胡适、谢冰莹、苏曼殊、胡也频。

二、已译出的诗有闻一多的《洗衣歌》、徐志摩的《灰色的人生》等四首。散文有鲁迅《野草》一篇、茅盾《从牯岭到东京》、章衣萍《从你走后》、郁达夫《创作之回顾》、徐志摩《自剖》。以这类作品代表作者文艺思想、作风特点，或反映作者生活背景。

三、计划出的专号有“文学革命号”、“革命文学号”、“中国新诗坛号”、“南国戏剧运动号”、“北平小剧院运动号”、“国故派与白话文学派之战”、“语丝与新月社、创造社之论战”、“汉译西洋文学书目”。

计划后面还附上几句话：“通过以上简略介绍使欧美读者对中国文坛有初步认识后，就开始刊登新文学的短篇作品。因为对象是对东方文坛茫然无知的读者，所以评论不求深刻，透辟。计划虽然大得惊人，但只要文坛同道襄助，我们并不视为畏途。”听这位青年评论员的口气多豪迈！

从上面计划可以看出，《简报》文艺主编的眼界是广阔的。新文学运动第一个 10 年间的成就，大体上能够包罗进去。我翻阅一至八期《简报》，发现的确刊出了一些大家的名作片断，对这些名家作了粗浅的评介。作品计有鲁迅的《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》、郭沫若的《落叶》、茅盾的《野蔷薇》、郁达夫的《日记九种》、沈从文的《阿丽丝中国游记》。除上述大家外，还译了一些“二月二来龙抬头”一类民间文艺作品。